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郑朝宗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郑朝宗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郑朝宗 编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郑朝宗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印张 4插页 330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70

书号：10173·471 定价：1.50元

序

敏 泽

在钱锺书先生的重要学术著作《管锥编》问世几年之后，终于有一部研究它的书将要出版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事情。我这样看，我相信看到了这部著作的国内外学人和读者，许许多多会和我具有同一的心情。

钱锺书先生一生博学多能，成绩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旧体诗、散文、小说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和造诣；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等书，不仅表现了他的知识的浩瀚渊博，而且也说明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能独辟蹊径，取得了世所公认的独特的成就和造诣。

钱锺书先生一生淡泊自守，埋头学问，厚积薄发，含英咀华。在《谈艺录》中，他不仅善于抉剔幽微，将中国传统诗文论中的精辟见解加以钩稽、发扬，而且融中西于一体，将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加以研究、比较和阐发，孤怀冥搜，戛戛独造。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评论家许克洛夫斯基、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特、法国诗人瓦勒利等的理论，在《谈艺录》中，都是首次被运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去；又如佛学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做这样广泛而又深入研究的，可以说

也是《谈艺录》的首创。再以《宋诗选注》而言，它在我国历史悠久的选学上，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革新。它不仅富有胆识地提出了“六不”的选诗原则，而且，在注释上既保持了传统选学的特色，又大大突破了传统选学止于注释、疏证的局限，对中外诗学中的许多规律性的问题，作了精见迭出的阐发和论述，文笔机智隽永，妙趣横生，毫无腐酸的虫鱼气。这充分表现了钱锺书先生超人的才华、识力和他的根基之坚实及深厚，使传统选学为之一变，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在近几年来的选学中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如果说钱锺书先生以往著作的渊博和精深，早已为世人所惊羡折服的话，那么，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问世，就更加使人神往目炫，叹为观止了。

《管锥编》真正称得上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体大思精、包罗万象之作，汪洋浩瀚，世罕其匹。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古籍的丰富的、富有辨伪精神的考释和探幽入微的阐发，旁征博引，联类无穷；而且有大量的关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比较和阐释。书中仅征引到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就多达千人左右，著作达一千七、八百种之多。如以国籍而言，则西方主要国家的著作：英、美、法、德、意等，无不遍及旁搜，足见其学识之深广渊博，卓绝一代。

《管锥编》不仅是钱氏一生至今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钱氏治学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善于打破空间上的中外，时间上的古今，以及人文学科中各种学科之间人为的藩篱，不繁琐为法，不画地为牢。由于他所积甚勤，所蓄甚厚，囊括中外，纵观古今，发而为文，就使他不仅

能够高瞻周览，不“以一端之解，而拟万端之变”，善于发前人所未发及已发，启人思智，新人耳目；而且能够纵横交错，左右逢源，有自由而充分地驰骋其想象力的余地，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钱氏治学的又一个特点，是他的充分的求实精神及辩证精神，他一贯憎恶虚张门面，反对牛首其门而狗肉其内，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都坚持严格的从实出发、循实求名的精神。他胸罗万卷，但又绝不是两脚书橱之类的学者：堆垛故实以夸其富，罗列典籍以显其博，但叩其所见，则除陈言外空无所有。钱氏完全与此不同，胸中自有炉锤，善于熔铸冶炼，钩玄提要，触类博通，探微知著。他治学既不株守陈见，又不拘泥章句。对于任何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总是纵览古今而又洞察秋毫，通观万象而又一以贯之，着眼一体而又分见两边，察一于万，而又寓一于万。他具有精微的辨析能力和深刻的辩证精神，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表现，一再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指出真理和谬误、祸与福、美与丑并非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使唯心主义谬论中也时有真知灼见、微言妙语，甚至“管论”也可成为好词，绝不应掩耳不闻。这样就使得他的著作真正做到了融汪洋博赡之学与精审卓绝之识于一体。

钱氏治学的再一个特点是，他虽然精通多国文化和文学，并且一贯重视借鉴邻壁之光，所谓“邻壁之光，堪借照焉”^①，却从来反对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奴颜媚骨或“西崽相”；他深深为祖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创造而骄傲，却又力反毫无出息的泥古主义。他是善于运用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给传统文化和文学以新的解释和赓扬，正所谓“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②钱

① 《管锥编》第一册166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

鍾书先生以新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传统所做的整理和发扬光大的工作，不仅受到了国人的尊重和爱戴，而且这也恰恰是他受到世界众多著名学者尊重、爱戴的根本原因。

以上这些特点，虽为钱氏一切学术著作所共有的，但在《管锥编》中却表现得最为完整和充分。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钱氏的清华大学同系后辈郑朝宗先生（钱氏是一九三三年外文系毕业，郑氏是一九三六年外文系毕业），也许是对钱氏的著作最早发生深刻兴趣的学者，他在一九七九年招收了四位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研究生，于一九八二年毕业。四位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我辱承赏契，忝任主司。四位研究生的论文总的说都写得很好，有的甚至写得相当出色，超出了硕士学位论文的水平，能够抓住《管锥编》中冥心独造的大端要旨，作出周详的、论据充分的阐发，思理朗然，文笔练达，实属难能可贵。和我一起参加论文评阅或答辩的周振甫、蔡厚示同志，都为之欢欣鼓舞，深感后生可畏。这四位同学不怕困难，反复攻读《管锥编》，终于做出了一点成绩。而目前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在阅读《管锥编》时，由于它的文体方面的原因，加上征引繁富，论述深微，颇有不得要领之叹（近年来我自己也颇收到一些这方面的反映，有的出版社甚至一再找我商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希望将《管锥编》中直接谈艺的部分加以摘编，并用白话文翻译出版），因此在关于《管锥编》的研究远未深入的情况下，将四位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给予出版，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四篇论文尽管情况不同，也并非每一问题的论述都达到了尽美尽善的地步，但总的说，却都有较好的以至相当出色的水平，对于《管锥编》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四篇论文论述各有侧重，合在一起来看，《管锥编》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大多涉及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热心玉成此事，对于促进海内外关于

《管锥编》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

本集除收进了四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外，还将朝宗先生前后撰写的关于《管锥编》及其作者的文章两篇一并收入，师徒之作合为一卷，允称美谈。

书行将付梓问世，又承朝宗先生谬荐，力促我为此书写一序言。我接触钱氏的著作虽晚，对《管锥编》等书却爱之甚深，也曾反复研读，又参加过四位同学的论文答辩，觉得这是良好的开端。因此，写了上面几句，表示我的欣慰和希望。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001) “前南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 (一) (209)

(021) “文学批评”比较方法 “文学批评” (二) (305)

(03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三) (315)

(10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101) 钱锺书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10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10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10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101)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 (315)

序 敏 泽 (I)

但开风气不为师 郑朝宗 (1)

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 郑朝宗 (9)

钱锺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何开四 (30)

引言 (30)

一 《谈艺录》——钱锺书唯物主义 (31)

美学思想的第一块基石 (31)

(一) 艺术与自然 (32)

(二) 对《沧浪诗话》的批评 (45)

(三) 对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观的批评 (55)

二 《宋诗选注》——钱锺书历史 (65)

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确立 (65)

(一) 对艺术美创造的再评价 (70)

(二) 对传统诗中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 (80)

(三) 怎样看待文艺批评的标准 (91)

三 《管锥编》——钱锺书美学思想 (104)

的一个突兀高峰 (104)

(一)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109)
(二) “写忧而造艺”	(125)
(三) 《管锥编》文艺批评举隅	(143)
结束语	(161)
钱锺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	陈子谦 (164)
引论: 论《管锥编》研究	(164)
一 钱锺书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	(178)
(一)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实际影响	(180)
(二) 从唯心主义的秕糠中择取辩证法珍宝	(196)
(二) 钱锺书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	
的矛盾法则	(211)
(一) “相反相成”	(212)
(二) “一贯万殊”	(221)
(三) “有无相生”	(230)
(三) 钱锺书文艺批评中的名实论	(242)
(一) 无名可得名, 可名非常名	(243)
(二) 有名无实, 名不副实	(249)
(三) 虚不夺实, 名必副实	(257)
论《管锥编》的比较艺术	陆文虎 (267)
(一) 引言	(267)
一 《管锥编》的比较方法	(269)
(一) 对比较方法的一般性解释	(269)
(二) 比较方法的基本功用	(272)
(三) “比较”在钱锺书思想方法中的特殊意义	(283)
(二) 《管锥编》与比较文学	(288)
(一) 比较诗学	(288)
(二) 具体的鉴赏和评判	(294)

(三) 别树一帜的比较文学·····	(299)
三 《管锥编》比较方法的逻辑基础·····	(305)
(一) 历历如贯珠的文体·····	(305)
(二) 连珠式文体的逻辑基础——“推类” 与“类推”·····	(314)
(三) 其他逻辑方法的运用举隅·····	(321)
四 与《管锥编》比较方法有关的若干学科·····	(327)
(一) 文化人类学·····	(327)
(二) 单位观念史学·····	(332)
(三) 语义学·····	(336)
(四) 普通系统论·····	(342)
(五) 心理学·····	(345)
(六) 风格学·····	(350)
结语·····	(355)
《管锥编》文艺鉴赏方法论初探····· 井绪东	(362)
引言·····	(362)
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鉴赏方法论·····	(363)
二 多学科多角度多门类的鉴赏方法·····	(385)
三 《管锥编》文艺鉴赏的民族特色及其他·····	(425)
后记····· 郑朝宗	(436)

但开风气不为师

郑朝宗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胸怀磊落，从不以名学者自居，这回竟屈尊到把自己和二十几岁的大学生等量齐观，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时陈寅恪先生正在中年，以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一校，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早已声名籍籍，钱锺书虽已毕业离校，但也只有二十三、四岁，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光阴如逝水，一转眼就是五十年，如今陈、吴二先生已归道山，钱先生虽健在，但也年逾古稀，皓然一叟，无复当年玉树临风的样子了。世事沧桑，人情反复，经过五十年的磨炼，他的学问愈加精邃，识见愈加深卓，品性愈加纯粹，他不辜负吴宓先生的热情期望，终于研治成一家之学，备受国内外爱好学术人的敬佩。吴先生地下有知，定当以老眼不花而自感满意的吧。

作为一个学人，钱锺书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不自满。在青年时代，他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其实他并不狂，因为他所指摘的往往只是事实上的错误，指出这样的错误对作者和读者都只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再说，他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万分严格。他每写一篇东西总是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我有幸最先拜读他的《谈艺录》手稿，第一次看时已觉很精采，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但恐怕不大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勤苦用功的。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我看这话用来形容钱锺书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的最大癖好，其余全要让路。在国外留学期间，为了博览不易看到的书籍，他竟日夜埋首图书馆的书丛里，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读书聚精会神，绝不旁骛，有时正在谈话，忽被手中的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便全神贯注，忘掉身旁尚有人在。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倚靠卡片和目录索引，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他身边也自有一种“秘本”（他的读书笔记）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只需一个来复。钱先生有这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

学校教育对他无疑也起了很大影响。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是非常雄厚的。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以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长时期与名师益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恰似一朵经受雨露滋润的名花，自然开得更鲜艳。不过，说到底，他能如此博学，靠的主要还是自身毕生不懈的努力。他不是一个安于小成的人，他要不断更叩向上一关。

在青少年时代，钱先生也曾走过一点弯路。那时他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沾些才子气味，爱学做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父执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仅做不出好诗，更严重的是会“折寿”。钱锺书果然从此改弦易辙去探索风格高的诗路。这件事足够说明他一生为人与治学之道。他这人最能耐寂寞，安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总是坚守着自己的冷摊子。他从不强出头，所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这种行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因此他还摆脱不了“狂”的称号。我们说这也不是“狂”而是狷，“狷者有所不为”。为了保持他所十分珍惜的高风格，钱锺书大约会心甘情愿地背着“狷”的字号一直走到底的。

应该指出，钱先生虽然守身如玉，但也不是镇日家躺在象牙之塔里做梦的，他不会比别人少关心国事。实际上，他对国家民族感情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这有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他的著作为证，这里不必多说。在治学方面，他富于民主精神，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先生之言，也决不拜倒于哪位大师的门下，象蜜蜂酿蜜似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以自成一家之说。和他见过面的人，往往惊叹于他书卷子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叔度汪汪如千顷陂”之感。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

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锺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结果遭到了拒绝。他说过：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因此他要结结实实地下苦功，不说一句陈言和空话，而每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才智的结晶，可以传之久远的。钱先生文思敏捷，下笔如风，有时当着客人的面写一封骈四俚六的书信，顷刻立就，文辞甚美；但他一般并不如此轻率，写一首律诗也要千锤百炼，力求精切。“对客挥毫”和“闭门觅句”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的。他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Somerset Maugham）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作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愤激的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恰似锦上添花，此书一出，钱锺书的声誉更高了，仿佛无所不能似的。然而，平心而论，他的最大成就恐怕还在学术方面。

钱先生在学术上究竟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关于此问题，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就是读书多，拿起笔来，繁征博引，尽是中西冷僻古籍，使人目瞪口呆，望洋兴叹。也有人认为他的真本领是懂得多种外语，著作里塞满蟹行文字，使得没上过洋学堂的土老儿吓破胆子。另有人认为他两手分执亚契欧铅，研究中西比较

文学应推他为巨擘。如此等等，不为未见，但也都是皮相之谈。俗话说“燕雀安知鸿鹄志”，钱锺书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立下志愿，要把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他深感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名家都只是凭主观创立学说，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惊动一世，过了些日子，则又如秋后的蚊蝇，凉风一扫，不见踪迹！其中有站得住脚的，也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参考，整个体系算是垮了。等而下之，还有一种批评家，头脑冬烘，眼光如豆，谈创作几同痴人说梦，难免扣槃扞烛之讥，甚至专拣牛溲马勃，拼凑成书。针对这些情况，钱先生独辟蹊径，不尚空谈，不作高论，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其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艺术规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理论，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东西，但他严格遵守的却是批判的原则。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着头脑去赶时髦，赶时髦是他所最鄙视的浅薄行径。他既致力于探索艺术规律，自然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习闻惯见、家喻户晓的那几种，这就是他爱繁征博引的真正原因。有些人讥笑他矜奇炫博，专以征引冷僻书吓人，他早已作了回答：“《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什么“冷僻书”，只是少见多怪罢了！他不抹杀文艺的国界，但又深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普天下的诗心、文心是可以一致的。这个主意倒不是他首创的，西方学者早有此意，但要给文艺订立普遍规律他们却无此本领，因为他们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艺所知有限，又每带着严重的偏见，所以容易开口便错。我国老一辈的硕学鸿儒对西方文艺也是十分陌生，因而也挑不起这个重担。环顾全球，目前最有资格从事文艺批评科学化工作的人，钱锺书应该是其中之一，而他在这方面已经奋斗几十年了。作为文艺批评家，他不汲汲于建立理论体系，而专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作鉴赏和评判的同时，他大量征引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资说明。就这样，一片散沙似的偶然发生的文艺现象，经过精心的探索，却被归纳成为一条条铜打铁造的艺术规律了。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这样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要比从概念出发的专事空谈更坚实牢靠，更合乎科学。这条路子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谈艺录》。在此书的序言中，钱先生明白宣告：“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色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那时，谈艺之书可进入科学著作之林的信念，已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了。四十年后，他又发表了《管锥编》。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时代镜子，其范围至少包括文、史、哲三方面，而精思锐笔，博学卓识，更在《谈艺录》之上，老成胜少作，果不其然。在《管锥编》有关文艺部分，钱先生用的仍然是具体鉴赏和评判的方法，他没有把自己一生心血凝成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据统计，此书前四册共一千二百多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孜孜矻矻于名物词句的核实，比较琐碎乏味；其余或论史，或衡文，或阐明哲理，皆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仅就谈艺部分而言，有重大发现可视同定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这些都可写成论文或专书，而钱先生则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了之，以实涵虚，点到即止。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故至如此，殊不知宁纳须弥于芥子而决不将蚁垤扩大为泰山，是此老的根深蒂固的习性。再说，他年逾七十，时间和精力也不容许他作